

台海兩地華人家庭圖像的變奏—— 評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mi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China*

賴淑娟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mi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China. By C. Y. Cyrus Chu and Ruoh-Rong Y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97 pages

自 1940 年代開始，由於台海兩岸的政治禁忌，台灣、大陸兩地的家庭研究一直是分道揚鑣、各自進行；大陸改革開放後，研究中國家庭的學者漸增，幾位原本在台灣做研究的西方人類學者或社會學者也漸漸將興趣轉到大陸，但不管是在地本籍或西方學者，都是將兩地的家庭做為個別處理的課題，而在同一個研究架構下直接做比較的則是鳳毛麟角。台灣於日治時期雖受到殖民統治，但也是現代化發展的開端，嗣後國民政府來台，先後歷經農業發展、以農轉工、階段性的經濟建設、教育普及與政治民主化過程，這當中雖歷經不同政權，但發展的歷程較為穩定，因此，台灣家庭的變遷主要是來自於現代化之社會力的作用。¹ 相較而言，中國大陸家庭主要受到社經變革與家庭政策的強烈影響，例如 1949-1965 年間，共產黨統治期間欲破除傳統、

1 關於現代化歷程與台灣家庭之變遷的研究，Arland Thornton and Hui-Sheng Lin 所著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1994) 算是具系統性的重要研究。

強調個人決定，而有婚姻法的推展，進行一連串去家庭化的作法；在政經計畫中又發起「大躍進」運動，加上後來數年的飢荒，導致高死亡率與新生代的延遲。1960年代則是文化大革命的劇烈變動，例如1971-1980年間爲了限制人口成長，相繼推行「晚、長、少」(later-longer-fewer)計畫與「一胎化」政策(one-child policy)；再加上中國大陸地理幅員廣闊，城鄉發展不平衡遠勝於島嶼台灣，對家庭之影響有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台海兩地雖有文化同質性，但政經發展的差異，再加上西方持續的影響，變遷中的華人家庭究竟呈顯甚麼樣的圖像，似乎成了家庭研究者重要的課題。

台灣一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將家庭研究的視野拓展到與中國大陸的比較，較早的研究可見於《華人婦女家庭地位：台灣、天津、上海、香港之比較》一書，當中使用1994-2002年間，在台灣、天津、上海與香港相繼展開的調查資料，²其彌足珍貴的是對偶夫妻資料的蒐集，主題著重婦女之家庭權力、就業與老人安養等問題。而朱敬一與于若蓉所著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mi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China* (以下簡稱「華人家庭」)則可算是後繼之較具系統性的比較研究。本書的研究資料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長期進行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簡稱PSFD)爲基礎，特點是使用具時間延續性的追蹤調查(Panel Study)，確實是比較家庭變遷的寶貴資料。華人家庭研究最常觸及的議題是西方理論與儒家文化家庭特性的對話，而隨著華人社會的擴散與政經勢力的影響，不同地區的家庭雖然在同質文化中展現出一定程度的普同性，卻也呈顯異質性的發展軌跡，在西方理論的運用上勢必產生豐富的歧異性與可能性；尤其在兩岸漸漸開放接觸的過程中，增進兩地社會文化實質經驗的理解是重要的歷史課題。因此基

2 此書為伊慶春與陳玉華主編，資料蒐集是先於1994-1996年間，於台灣進行夫妻與已婚婦女的面訪，1996-2002年相繼於天津、上海及香港進行調查，所集結的書於2006年出版。「華人家庭」使用的資料為1999-2006年間進行的調查，集結研究成果於2010年出版。

於學術理論的探索、或基於社會發展的迫切性，「華人家庭」的研究成果實符應了這二方面的需要。

台灣、大陸兩地家庭圖像的普同性與差異性

「華人家庭」從家庭經濟的角度分析台灣與中國東南區域當代家庭的特性。本書是非常經典的家庭比較研究，作者所採取的比較手法筆者稱之為「雙重映照的三度策略」，即是以西方家庭經濟與人口傳統理論的模式為主要對照架構，同時比較台灣與大陸家庭的異同，再將比較的結果放在西方家庭變遷的脈絡中進行反思。筆者認為這樣的比較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的反思，首先是審思西方家庭相關理論的普同性(*generality*)，亦即西方家庭發展的歷程是否也發生在兩地的華人社會？再者，兩地雖然歷經現代化的洗禮，而呈顯與西方類似個人化的經驗，但整體上保有何種持續的、堅韌的漢文化特殊性？最後，在漢文化的大傘之下，兩地不同政治經濟變遷的經驗，對家庭造成衝擊，而衍生同中有異的家庭型態為何？

「華人家庭」共有十三章，第一章為導論（闡述研究的背景與價值），第二章敘述台灣與中國大陸政經歷史變遷的過程，最後一章為結論，第三到十二章則涵蓋兩地家庭不同面向的比較分析，主題包含婚姻模式、家庭結構、家務分工與決策、生育與兒女教育投資、財產繼承分配策略，還有代間資源互惠與社會流動等。在包涵分析主題的十章當中，每一章針對一個主題作深入的理論探討，繼而設計細緻的模型、做實證資料的量化分析與詮釋。

在閱讀過程中，每一章經過量化模型設計與多重的比較觀點，呈顯兩地家庭各個面向同中有異的特性（清晰地呈顯於3至12章中），然而讀完全書後，若將各章主題扣連而形成一個整體家庭圖像時，到底台灣與中國家庭整體圖像的特殊性或差異是甚麼，在結論時似乎還是很模糊，猶如看了一齣齣精采的戲，到最後卻有倉促結束的遺憾。在本書結論中，作者雖然針對各章的研究發現做綜合性的論述，但筆者提出以下幾個疑問進行討論，同時也統整本書的研究發現，嘗試描

摹台灣與中國家庭整體圖像的異同。

首先，在導論中作者很清楚地交代為何選擇華人家庭為研究對象，因它保有與西方殊異的特性，這些特性都是挑戰或深化西方家庭理論的基礎；作者也交代為何選擇台灣與大陸東南區域，因在地理位置與發展歷程是較接近的（相較於大陸其他地方），但同時兩地又經過非常不同的政治統治與社會變遷過程，因此兩地的相似性可做為與西方社會的對照，其相異性也可看出政治經濟歷史過程華人家庭的多樣性，這也是筆者所提「雙重映照的三度策略」的精采之處。但在結論中，作者用主要的篇幅談與西方的差異，這樣的結論似乎把台灣與中國東南區域兩地看成是一個同質的單位，兩地的差異與比較則不見了，其副書名的重要內涵卻於結論中掠影似地零星出現，令讀者產生比較單位混淆的模糊感。這樣的混淆感可能來自於書名與比較策略的不一致性，本書的主書名「瞭解華人家庭」可能是為了凸顯與西方的不同，因此結論著重在與西方的比較，而忽略兩地華人家庭的異質性。另外，書名的意涵太廣泛，因華人家庭不只是台灣、大陸，還有新加坡、香港或馬來西亞等等，這樣的標題較缺乏焦點，因長久以來許多華人家庭研究都是在與西方對話，反而本書副書名才是筆者認為更獨特的問題，華人家庭的多樣性恐怕也是西方或華人學界更想瞭解的。因此本書書名若能稍做修改，或許更能凸顯本書的特性與重要性。

另外，在結論中，作者認為整體而言兩地華人家庭具有兩個主要特性：宗族繁衍與重視教育，這是由來已久的傳統，華人家庭在歷經社會變遷過程中，制度、行為雖然有所改變，但並非完全複製西方個人主義的模式，反而仍然保存華人家族集體性特質，即使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仍持續地、間接地反映在家庭行為的各個層面。宗族繁衍是華人家庭由來已久的特性，諸多文獻都已發現即使歷經社會變遷，這個特性仍以不同形式持續地存在（參見本書第3至5章、10至11章）。但教育成爲一個重要的主題，筆者認為可再商榷，雖然華人家庭普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的密切關連，而予特別重視，但本書與教

育有關的三章（第 7, 8, 12 章）多是討論性別偏好與家族資源傳承的問題，因此在討論對兒女的教育投資時，其要旨實際上是處理性別的問題。華人家庭是一個由輩份與性別構築的階層系統，筆者認為本書各章的主題若歸納在宗族繁衍與性別差序這兩個面向，或許更能以華人家族系統的階層性凸顯與西方的不同，以及海峽兩地之間的同中有異的特性。

筆者嘗試於下文以宗族繁衍與性別差序這兩個面向連結本書各章的研究發現，歸納台灣與大陸東南方在歷經不同政經變遷後，所形成的整體家庭圖像之普同性與差異，姑且做為閱讀本書之後的心得整理與結論補充。

首先，先略述作者已歸納出台灣與大陸兩地家庭與西方相似的現代化特性，例如結婚年齡往後延伸，婚姻選擇的自主性增加，婚配對象傾向同質的階級、教育與族群，以及出生率降低等，這些現象大致與 Goode (1970)對現代化家庭朝向個人化發展的推論吻合，儘管其形成的機制可能有所不同。再者，與西方有所差異的，尤其在代間關係上，兩地呈顯出華人家庭特殊的集體性，例如孝道精神仍展現在兒女與父母共同居住，或彼此近距離的居住安排及時常探望。台灣與大陸社會安全制度的資源有限，因此老年安養的功能仍寄望於家庭成員的付出與照顧，而兒女對父母的金錢支持與父母在先前各個階段對兒女的付出（金錢或協助照顧兒孫）有密切關連，這隱含兒女還債與回報的態度，也是一種家庭互利支持(family reciprocal support)的模式，與西方著重父母單向提供支持的利他(altruism)模式，³有所不同。華人家庭財產的分配亦與西方非常不同，西方的父母通常不會在生前早早就將財產分給兒女，免得日後對兒女失去影響力，學術上稱之為策略性遺贈假設(the strategic bequest hypothesis)。然而華人家庭研究卻顯示，已接受分產的兒女，反而與父母住得比較近，且較常探望，尤其是那些與親族社會網絡有密切連繫的人更是如此，那是因為集體性的壓力

3 參見本書第 196, 220 頁：[西方家庭]兒女多以探望為主，較少以金錢回饋。

會促進兒女實踐孝道。再者，教育投資上，西方適用的是性別中立的資源稀化假設(resource dilution)，亦即兄弟姊妹數目越多與生育間距越密，每個人得到的教育資源越少；然而，華人家庭因為重男輕女的文化，教育資源偏向男孩，甚至由年長的姊姊賺錢支持弟妹就學，而此現象於年輕一代日漸改善。

關於兩岸的差異，則分為親族繁衍與性別差序兩方面來看。親族繁衍的特性表現在婚姻模式、生育、代間關係（居住安排、支持互惠、財產繼承）等面向。台灣在觀念上是較傳統，但實際做法上傾向現代化與傳統的混合；大陸在觀念上較非傳統，在實際做法上雖有現代性特徵，但政府政策的威權是主要的推動力，同時在某些方面做法比台灣更傳統。例如在觀念上，台灣受訪者贊成「至少要生一個兒子以傳衍後代」的比例(42.54%)比大陸受訪者高(27.45%)，⁴但在兩地此觀念都隨著教育程度提升、世代年輕化及都市居住地而減輕。而在實際做法上台灣折衷家庭比例較高（台灣 40.51%、大陸 32.08%），與公婆同住仍有促進生育的影響力（縮短生育間隔的時間），已接受父母財產的成年兒女在親族網絡中基於孝道壓力，因而與父母住得較近且探望的次數亦較高。相對的，大陸折衷家庭比例較低（大陸 32.08%、台灣 40.51%），⁵這是與戶口註冊食糧配給制度，使民衆傾向分戶註冊及鄉下隔代居住、城市擁擠等情況密切關連；另外在大陸，公婆共同居住與生育時間沒有明顯相關，這可能是新婚夫婦生育的計畫受「晚、長、少」(later-longer-fewer)的政策引導，而非回應家長的催促或期待。同時，已繼承父母財產的成年兒女比較不會因與親族網絡的密切往來，產生孝道壓力，而與父母住得較近或較常探望。這可能因為中國歷經土地改革與文化大革命後，制度性的變遷撼動了家庭權威與世系結構，使得親族網絡的影響力式微。另一方面，中國有一些現象比台灣更傳統，例如男女嬰兒出生性別比例、婚配過程專

4 參見本書第 72 頁 Table 4.4。引用的百分比數據是妻子生育年代介於 1971-1979 年的受訪者。

5 參見本書第 53 頁 Table 3.4。

業媒人介入比例等都比台灣高。偏重兒子繼承財產的現象，大陸比台灣更明顯，都由兒子繼承的比例比台灣高出 15%，平均分配給女兒與兒子的比例則低了一倍(p.141)。

兩岸的性別差序反映在兒女的教育投資、財產繼承分配、家務分工與決策等面向。首先在性別觀念上，台灣較傾向男性中心，例如在性別規範相關的問題上，台灣受訪者回覆「男性養家持家，女性持家」、「必須至少生一個男孩以利傳承」表示重要的比例都是比較高的(p.136)。但關於兒女資源傳遞的做法，大陸較為傳統，例如財產繼承安排，台海兩地雖都是以男性為主，但兒子／女兒之間的分配，台灣比大陸平均。在教育投資的性別偏好上，在大陸亦更為明顯(pp.172-175)。另外，在婚姻方面，大陸的夫妻傾向較平權的關係，雖然大部分女性都擔負家務工作，但台灣女性所擔負的是男性的三倍，中國女性則為男性的二倍。另在家庭決策方面，大陸夫婦一起做決策的比例較高，台灣家庭中妻子獨自做決策的比例較高，台灣的妻子看似較有權力，但也引發一個問題：家務決策的執行反映的是權力嗎？還是只是家務責任的延伸？

總體而言，大陸的夫妻關係呈顯較均衡的權力分配，但在後代資源傳遞方面，性別不均衡的現象較明顯；而長輩或家族網絡對兒女孝道或生育責任的影響力在台灣較為明顯。Baker (1979)曾精要地論及西方與華人家庭基本差異：西方家庭是為支持個人而存在，而在華人傳統中，個人的存在是為家庭的延續。至今華人家庭仍呈顯集體性與父子軸代代相傳的基調，然而在此格局中，隨著不同區域的政經歷史過程，而有多重的變奏。

資源理論之再思

關於婚姻權力的議題，相對資源理論是常被使用的解釋觀點，此觀點某種程度適切地反映了台灣夫妻互動的狀況。但因著華人社會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及區域性的差異，夫妻資源的影響力亦有所歧異。「華人家庭」一書中發現，在台灣居住安排方面，資源的因素有顯著

影響力，例如妻子資源較多的，傾向不與公婆同住，而丈夫資源較多的，則傾向不與岳父母同住，夫妻資源呈顯一種相對性的競爭。在大陸則是結構因素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兄弟姊妹數、是否有小孩、城鄉居住地、父母是否健在等，這些現實條件與居住安排的考慮較為密切關連，除此之外，丈夫資源會加強與夫方父母同住的可能性。

再擴展到家務決策與分工來看，台海兩地妻子教育與收入都能增強妻方的權力；並且，台灣夫妻若與女方父母同住能提升妻子權力，但在大陸，與父母同住則對婚姻權力沒有影響。因大陸年長者與女兒同住可能是基於年老或經濟的現實需求，無法提升女兒在家庭中的權力；除此之外，大陸丈夫的教育會提升男方自己的權力，台灣丈夫的教育則無顯著影響力（只有 saving and investment 是顯著），反映大陸男性資源有權力施展的作用。

綜合上述的發現，作者簡略地總結：台灣的家庭行為或態度較為傳統，必須藉助妻子的資源來撼動傳統的居住安排；大陸丈夫的資源產生一般男性中心的影響(pp.54-57)，忽略了資源理論與兩地不同性別文化脈絡的問題，而筆者認為這可做為省思西方資源理論的一個很好的起點，亦有助於捕捉兩地整體性別規範的差異。首先回顧 Rodman (1972)強調文化脈絡的觀點，他認為全世界各地的父權文化，從極端父權到完全平權，如同一連續線，嚴謹程度不一，但大致可區分為：極端傳統父權社會、修正父權主義社會、過渡性的平權社會及完全平權的社會。夫妻相對資源的影響力隨著在不同程度父權文化社會而有差異，例如在極端傳統父權社會或完全平權的社會，夫妻資源的影響力是不顯著的，因各自文化力已形成關鍵的指導原則，因此夫妻相對資源影響起不了作用；但在修正父權主義社會，平權的思想漸漸透過最早受教育的男性而傳達感染，因此在這種類型的社會，丈夫的教育會與丈夫權力呈現負相關；而在過渡性的平權社會，夫妻相對資源才產生較活躍的競爭性。若運用 Rodman 的觀點來詮釋本書的研究發現，台灣似乎介於修正與過渡平權的社會。在居住安排方面，台灣夫妻相對資源有相互較勁的趨勢，而在夫妻權力方面，妻子的資源能揮影響

力，但往往同時受到家庭結構的牽制，而非丈夫的資源；在大陸，妻子資源有影響力，但丈夫的資源同時形成競爭的力量，倒是居住安排（家庭結構）並沒有產生約束女性的力量。筆者推論台灣歷經社會變遷與教育普遍的趨勢，妻子資源增加，男性也受平權思想影響，對偶婚姻的特性漸趨明顯，但長輩的態度思維透過共同居住仍會限制夫妻間的平等性。⁶而在大陸，可能是共產黨政策長久以來鼓勵男女平等，女性在勞動市場上也沒有缺席，性別文化較似 Rodman 所提「過渡性的平權社會」，但隨著開放後，傳統家庭文化有一股復振風潮(Davis and Harrell 1993)。在父權主義的心態下，男性似乎也嘗試藉著增加的資源，挑戰女性相對的權力；另外，大陸與父母共同居住的安排，往往是基於現實條件的考量，長輩的傳統權威似乎沒有產生抑制性別平權的力量。

性別化的代間契約

一個長久穩定的文化模式通常有其相應的社會功能，孝道是華人家庭重要的文化特徵，背後有一理性計算、確保家族延續的機制與功能。Greenhalgh (1985)以台灣北部 80 個家庭密集面訪的資料，用量化方式解析台灣工業發展初期，年輕女性離開鄉村，移動到都市，在工廠、店家、中產階級家庭工作或幫傭，成為台灣現代化第一批領有薪資的女性。但其收入往往是以孝道之名回饋給家庭，特別是協助家中兄弟繼續受教育，同時也完成默會的代間契約。所謂代間契約即是女兒於結婚前還清父母養育之債，男性理當於家中奉養父母、繼承家產，使老有所終，家族得以延續。因此家族的延續是透過女兒經濟的協助，使兒子順利取得較佳的社會位置，以順利完成日後養家、延續家族的責任。現代化歷程雖然賦予女性賺取薪資的機會，然而勞動市場與家庭的父權邏輯，使女性相對地仍處於低落、附屬的社會位置。

6 男性資源不顯著有兩個可能，可能是因教育過程中的平權思想強化妻子權力，也可能教育化為權力強化與妻子之間的競爭性，但其強度都不比家庭結構或妻子資源高，故而在統計模型上不顯著，也正顯現男性權威的下放或減弱。

這個研究在 1980 年代對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女性地位、華人家庭孝道與性別邏輯的解析均極具啟發。而於二十多年後，本書（第 7, 8, 12 章）針對這個問題做延續性的研究，並與中國大陸的家庭做比較，從不同角度針對這個問題，用更大規模的樣本、更精緻的研究模型，使這個女兒與代間契約的故事更為豐富。

本書以西方關於家庭教育投資的「資源稀釋」(resource dilution)理論為基礎，並延續當初 Greenhalgh 所提的問題，在設計模型中以側重兄弟姊妹結構(sibling structure)的概念，放入更明確的解釋變項，例如性別、出生別、兄弟姊妹數量、出生差距等(sex-seniority-spacing)，解析華人家庭父母在考慮兒女教育投資時，背後性別化經濟理性的邏輯，進而提出修正型的資源稀釋觀點：西方家庭代間資源的傳遞比較不強調父子軸的延續與兒女的回饋，而是由上往下單向地付出，因此父母的收入會隨著兒女數的增多而被稀釋。然而華人家庭孝道與偏好兒子的文化，以犧牲長女的教育機會，使資源集中於男性，而產生一套特殊的教育資源策略，且台灣、大陸兩地都有類似的現象。作者更進一步檢視社會變遷的影響，而將世代、家庭經濟與兒女本身能力表現的變項放入模型中，發現犧牲長女的現象隨著家庭經濟的改善及世代的年輕化，而漸漸式微，同時兒女本身能力表現也成為父母是否延續教育資源的重要考量，顯示華人家庭在兒女教育投資上漸與西方「資源稀釋」觀點有所聚合。最後，犧牲長女現象的式微引發兩個值得注意的社會意涵。首先這可能是反映性別文化與經濟的關連性，重男輕女其實是潛藏在經濟結構中，只有當家庭資源窘困，須在兒子與女兒之間二選一時才會顯現出來。或者此結果反映了男女平等的觀念真正被接受了，若是如此，是否也隱含父子傳家的忠誠正日漸淡薄，這都需要進一步探究。總之，筆者認為本書對於延續華人家庭性別文化與代間傳承議題，以及量化研究模型的設計，都有重要的貢獻。

華人家庭研究一般較少觸及族群比較，本書第 12 章探討台灣家庭的兒女教育投資時，考慮到了族群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閩南族群，年長世代的外省人教育年數較高，且重男輕女的教育投資較

不明顯，但在年輕世代的教育則沒有顯著的族群差異。作者認為外省人年長世代歷經戰亂，把教育當成可移動的資本，因此特別著重兒女教育，但年輕一代對於過往的歷史記憶漸漸淡忘，⁷ 教育投資不像以前那麼受重視。也就是說族群間教育成果的差異是因為對教育投資的態度不同所致。但筆者認為這並沒有解釋為何閩南族群教育年數較少。這樣的問題在先前研究均曾討論過，其一致性的解釋是來自父母社經背景的影響，早期的研究認為因為外省族群任職於軍公教單位的比例較高，且享有私人部門工作者所沒有的福利，例如子女教育補助費等，在經濟無虞的情況下，子女升學較無阻礙。⁸ 最近的研究則發現教育補助費仍有顯著影響，但重要性遠低於父代的階級背景與教育程度，因在台灣族群遷移歷史過程中，外省族群年長輩有較高比例屬於高教育背景的白領階級，經濟收入穩定，對子女教育期望亦較高，而產生代間階級傳遞的效果（范雲、張晉芬 2010）；另外，因為第一代外省族群早期沒有土地農產、沒有足夠社會網絡的支持，或者沒有在島上生根的發展計畫，因此以教育做為較保險的投資，而閩南家庭則有農業或私人中小企業等其他營生方式。爾後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分殊化與階級流動，族群間區隔的差異性漸漸消滅。本書在比較台灣與大陸的家庭型態時，綜合的結論是認為台灣家庭的變遷主要來自於現代化的影響，而大陸則來自於政策與政經變革的強烈衝擊，但從台灣內部不同族群家庭的發展來看，亦不可忽略來自制度與政策的影響力。

結論

如前文所述，在兩岸開啓禁忌大門，再次進入頻繁接觸的歷史階段，本書的家庭比較研究，在理論的探索與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都呈顯其重要性。然而對於兩岸同質多元的整體家庭圖像、性別差序關係的異同、族群與家庭政策的關連等，都有可以再發展的空間。

7 參見本書第 257 頁。

8 如 Tsai et al. (1994)，林忠正、林鶴玲(1993)，林鶴玲、李香潔(1999)。

參考文獻

- 伊慶春、陳玉華編(2006)變遷中的華人婦女家庭地位：台灣、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比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林忠正、林鶴玲(1993)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見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101-160。台北：業強。
- 林鶴玲、李香潔(1999)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1(4): 475-528。
- 范雲、張晉芬(2010)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9: 259-290
- Baker, Hugh D. R. (1979)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Deborah, and Stevan Harrell, eds. (1993)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ode, William J. (1970)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 Greenhalgh, Susan (1985) Sexual Stratification: The Other Side of "Growth with Equ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2): 265-314.
- Rodman, H. (1972) Marital Power and the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 50-69.
- Thornton, Arland, and Hui-Sheng Lin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sai, Shu-ling, Hill Gates, and Hei-yuan Chiu (1994) Schooling Taiwan's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 243-263。